

吴 思 敬 诗 学 研 究 论 集

诗坛的引渡者

霍俊明 © 主编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吴 思 敬 诗 学 研 究 论 集

诗坛的引渡者

霍俊明 © 主编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坛的引渡者 / 霍俊明 主编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2.6

ISBN 978—7—5354—5744—8

I 诗… II 霍… III. 诗歌研究—中国—文集 IV. I207.22—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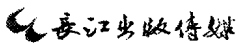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43348 号

责任编辑: 沉 河

责任校对: 陈 琪

封面设计: 西西里の空气

责任印制: 左 怡 包秀洋

出版: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武汉市福成启铭彩色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 24 插页: 6 页

版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337 千字

定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从新诗潮到新世纪（代序）

霍俊明

从新诗潮到新世纪似乎暗含了某种进化论的味道，但重要的是作为一种时间流转，中国的新诗写作和批评在期间呈现了众多的龌龊性、启示性和象征性。而1970年代后期以来的三十多年，吴思敬的诗歌理论与诗歌批评不仅具有明显的个人创造性，而且更具有现实针对性和历史的重要性。他对“心理诗学”的创设与开拓，对中国现代汉诗的现代性的反思和厘清已经成为今天诗歌界研究方法的范本。新诗潮时期他对先锋诗人予以学理上的支持，在相关诗学难题上作出了相当深入的反思与拓展。此后的第三代诗歌以及八九十年代转折点上，他对更为繁复驳杂的诗学难题的持续性的研究和对诗歌现象的精准、独到、客观的评价与反思都呈现了一个重要诗歌理论家与批评家的特殊之处以及不可替代的重要性。而新世纪以来，他对众多更为复杂的诗歌问题和相关场域的关注则提供了一份带有明显的启示性的诗学思考与检视。

反观和检视文革之后“新时期”以来的诗歌发展、诗歌理论和诗歌批评，吴思敬显然是中国诗坛和新时期以来新诗发展史中一个具有相当代表性的人物。如果说“新诗潮”的权威评论家谢冕更多侧重于澎湃的甚至浓烈的主观情绪的渲染以及感悟式的诗歌批评方式的话，那么吴思敬则是典型的学者型批评的代表。吴思敬在几十年的诗学研究及诗歌批评中，在主观与客观、情感与理性、激情与冷静、经验与知识、历史与现场、科学的“真”和艺术的“美”之间找到了一个近乎完美的契合点和平衡点。所以，吴思敬的诗歌理论与诗歌批评不仅准确、全面、深入、客观，而且在他的不同时期的评论中他对诗歌文本以及诗人的分析中仍然有着独到的妙悟和“印象”色彩的分析。基于此，诗意化的感受与理性化的逻辑思维如此水乳交融地呈现在吴思敬的诗歌批评话语当中。所以，吴思敬的诗歌批评与诗歌理论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不仅有理论甚至哲学的高度，具有强烈的历史感和知识分子情怀，而且

有着独到的生命感悟、精当生动的阐释、准确精辟的语句。这成就了其批评文本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诗性魅力以及知识分子的良知和使命感。尽管吴思敬并不写诗（可能写过诗，但不示人），但是他以诗人、哲人融合的身份进入到诗歌批评话语当中。正如他所强调的一位诗人当他把喷发于生命之泉的想象力指向世界的秩序、放射出人类智慧之光的时候他也就同时具有了哲学家的气质，一位哲学家当他处于创造的最佳时刻直觉或顿悟到真理的一瞬间他也同时领略了诗人的发现的快乐。而吴思敬的诗学理论研究和诗歌批评就呈现出了“诗人”发现性的原创力和哲学家“探险”性的“智慧之光”。这也正是吴思敬一生的诗学追求，“诗人是人类心灵的探险家，这种探险，只有借助哲学的光亮才得以进行。哲学家也是探险家，不过他们是从隧道的另外一侧进行的。只要是真正的探险家，有一种锲而不舍的精神，他们最终将相会在一起”^①。

—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诗歌在文革结束之后经历了中国现代诗歌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繁荣与开放期，甚至 1980 年代在过去多年之后仍然因为被视为诗歌发展少有的黄金时代而为人们不断地津津乐道。这一年代理想主义和启蒙主义的诗歌光辉仍然照耀着此后一个个在物欲年代和“拆迁”年代挣扎的诗人。这注定了 1980 年代成了后来者所不断羡慕和缅怀的难以复现的精神高地。上个世纪 70 年代末期以来中国诗歌发展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喧嚣甚至“边缘化”的过程，似乎可以说这 30 年的诗歌发展是前所未有的大起大落的转换过程。据此这一时期的诗歌写作、诗歌理论与诗歌批评所面临的问题就不能不是空前复杂的。而作为中国当今具有相当影响力的现代诗歌理论与批评的代表人物，吴思敬始终与新时期以来繁复多变的诗歌发展始终相随。吴思敬以其特有的诗情、激情、理性和活力，以其深厚的理论修养和敏锐的发现能力，将中国现代诗歌理论与批评推向了一个高峰。

吴思敬几十年的诗歌理论与批评的版图上，既有对中国新诗的宏观的、整体性的历史研究和理论梳理（重要的如《中国新诗理论：在现代化的进程

① 吴思敬：《后记》，《走向哲学的诗》，学苑出版社，2002 年，第 382 页。

中的诗学形态》、《二十世纪中国新诗理论的几个焦点问题》、《20 世纪新诗思潮述评》等），也有对诗坛现象的剖析以及诗人和诗歌文本的翔实、深入、准确、独到的个案研究。即使是在 1990 年代以来诗歌在剧烈的社会转型期后所面临的冷落、边缘与尴尬，甚至到了近十年来物欲和现代化进程空前加速的过程中诗歌写作与诗歌批评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吴思敬仍然以个性化的方式深入了诗歌历史和繁杂的诗歌现场当中。尤其是对 1980 年代以来复杂的多元诗歌格局和驳杂的诗歌现象予以独到而精准的追踪、考察、分析和反思，确立了一个诗歌理论家和批评家的系统、完整的话语谱系。

在 1970 年代中后期的时代寒风中，吴思敬就已经站在了中国诗歌飙风猛吹的路口。吴思敬以亲历者、见证人的身份在一场场诗歌事件、诗歌运动和诗歌活动的交替中相当清醒、敏锐和富有真知地以批评家的身份对中国诗歌发声，对复杂的诗歌现象进行命名。无论是对历史长河中诗歌历史的考古学的重新挖掘与发现，还是对诗歌流派、社团和诗人的探幽发微，以及对新时期以来的诗人、文本和现象的关注与反思都呈现了其作为批评家的独到、宽容、踏实、严谨、求真的风格。而正是由于对青年诗人的生活状态、思想状态和诗歌创作状态的深入了解，在后来的关于“朦胧诗”的论争中，吴思敬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与这些青年诗人站在了一起。正是因为一种新的美学诗潮的崛起，作为诗歌批评家的吴思敬已经提前认识到诗歌批评这种特殊的话语方式也同样应该经历历史性的转换和新生了。所以从朦胧诗的初期到后来激烈的朦胧诗论争，此时已经近 40 岁并不年轻的吴思敬自始至终是站到了朦胧诗人这一边，而此时的臧克家和艾青等老诗人仍然对北岛等这些“朦胧”诗人、“古怪”诗人抱有相当大的偏见。而对中国诗歌发展的历史和诗歌批评的现状敢于自我反思甚至批评的态度，正是吴思敬作为诗歌理论家与批评家相当突出的一个可贵品质。吴思敬则由于其敏锐的观察视角、深入的反思精神和知识分子良知的立场使其能够始终保持对诗歌批评工作的自觉与清醒。他不被政治年代的意识形态美学和经济年代的媚俗批评所牵制，而是始终坚持着与时代和历史紧密相关的批评话语方式。在 1978 年以来错综杂乱的诗歌现象面前，吴思敬更像是在迷蒙变幻的诗歌迷津中健行的引路者，是苍茫时代的诗歌理论的旗手。他也更像是时代屋顶上的一个敏锐的避雷针，提前领受了一个时代的诗歌真相和诗人的本真面貌。

1980 年“朦胧诗”论争序幕的“南宁会议”召开。在这次影响深远的南宁会议后，关于新诗潮的论争开始由口头的会议讨论转入初步的纸面文章的

争论。尤为可贵的是，从关于新诗潮的论争最初开始，吴思敬与其他理论家和批评家的一个最重要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始终强调要正确看待一大批青年诗人的创作，而不能用行政或其他强硬的手段干预和武断地否定这些青年诗人的创作。他一再强调青年诗人正是中国诗歌的未来和主力。而历史已经证明，吴思敬对新诗潮以及青年诗人的态度与认识是具有前瞻性的。从上个世纪 80 年代开始，作为当时“新诗潮”批评家的代表人物，吴思敬完成了一系列重要的诗学论文和诗人专论。尤其是对朦胧诗人江河、顾城、舒婷等的评价文章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和轰动。对于当时刚刚在诗坛崭露头角的这些青年诗人，诗坛大多还处于陌生和旁观的姿态，而这时的吴思敬却已经写出了具有理论高度、时代特征又深入文本和诗人灵魂内部的重要批评文章。这种“发现”的能力一直伴随着吴思敬的诗学道路，中国当今的众多优秀诗人（如顾城、骆一禾、伊沙、侯马、江非等）当年都曾受过他的扶持和激励。

二

吴思敬自 1978 年开始的诗歌理论与诗歌批评不仅在于他一系列重要的理论著作和学术论文的每次面世都引起了诗歌界的关注，更重要的在于吴思敬作为一位诗歌批评家所具有的一个重要的特质。这就是不仅具有“发现”与创设的理论才能，而且具有对诗歌和诗歌批评工作的“赤子”之心。

而几十年来，吴思敬的诗学道路主要是在两个维度上展开。

一是在新诗理论问题上的深入研究以及具有开创性质的带有个人谱系性的诗歌理论的建构，这主要体现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以来吴思敬出版的一系列诗学研究专著中（如《写作心理能力的培养》、《诗歌基本原理》、《诗歌鉴赏心理》、《心理诗学》等）。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吴思敬的第一部学术专著《写作心理能力的培养》虽然不是诗歌研究专论，但是正是在研究写作过程中对心理学的深入学习对此后的诗歌研究尤其是《诗歌基本原理》、《诗歌鉴赏心理》和《心理诗学》等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而吴思敬也成为国内最为系统也最为权威的从心理学的角度研究诗歌原理、诗歌鉴赏的代表性理论家。实际上，早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初期，吴思敬在一些文章中就已经开始用心理学的方法来研究诗歌。1987 年 2 月面世的《诗歌基本原理》无论是在方法论还是在诗歌理论的建构体系上都取得了突破和创新。时至今日，这本书仍然是目

前诗歌研究者和大学文科研究生们的必备书目。应该说《诗歌基本原理》的问世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的方法论和“主体性”成为“显学”是有着时代关联性的。《诗歌基本原理》是吴思敬严格意义上的第一部诗学理论著作。而这本书的面世是具有开创性的，即吴思敬较早开始运用系统科学方法和心理学方法来研究诗歌，注重从诗歌的历史和现状出发整体性地把握诗歌这种文体的特殊性。《诗歌基本原理》并没有像其他的同类著作那样从理论到理论的抽象论证，而是注意从诗歌的历史渊源、传统和诗歌的现状出发把握诗歌这种文体的特殊性。在各个相应的理论部分都加入了古今中外大量的诗歌文本。再加之著者对这些诗作的生动、准确而又深入浅出的分析与阐释从而避免了一般的文学原理著作的空洞、抽象和干瘪说教的毛病。而在研究方法上，吴思敬则较早尝试运用系统科学方法和心理学的方法。正是因为如此，《诗歌基本原理》这本书甫一出版就引起了学术界和诗歌界的普遍关注和赞誉。而《诗歌鉴赏心理》则在相当系统和完备的基础上完成了关于心理学与诗歌鉴赏之间的理论难题。《诗歌鉴赏心理》系统而深入地阐释了诗歌鉴赏的心理条件、心理流程，准确而富有启发性地剖析了诗歌读者特殊的审美心理结构和鉴赏的心理状态与效应等，从而开创了从心理学的角度研究诗歌鉴赏的别开生面的道路。《诗歌鉴赏心理》无论是对诗歌读者的审美心理结构（包括审美心理结构的功能、要素和形成）、对诗歌鉴赏的心理条件（如心理讯息贮存、心理定势、鉴赏处境与心境、注意等）的深入分析，还是对诗歌鉴赏的心理流程（语言讯息的接收、意象的显现、深层意蕴的探求）以及诗歌鉴赏的心理状态与功效的系统论述都开辟了从心理学的角度研究诗歌鉴赏的道路，对此后的相关研究有着相当的启示性和参照价值。此后，作为《诗歌鉴赏心理》的姊妹篇《心理诗学》继续运用心理学的方法考察诗歌生成的特殊原理，相当完整系统地考察了诗人创作过程中心理活动的特殊性和重要性，从而建构了属于吴思敬的诗学理论体系。

二是同时完成对新诗历史发展过程中重要的诗人、流派、社团的研究以及对当下的诗人、诗歌现象及潮流的现场追踪、梳理与反思。这主要体现于《冲撞中的精灵》、《诗学沉思录》、《走向哲学的诗》、《自由的精灵与沉重的翅膀》等诗歌批评文集以及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发表的一系列具有相当影响的诗歌批评文章。这都对新时期30年以来复杂的诗歌发展动向、态势和现象做了鞭辟入里、准确、精当的阐释与分析。由于新时期以来中国诗歌发展的空前繁荣甚至驳杂，当“朦胧诗”退潮，“新生代”诗歌涌现出来之后，众

多的研究者都患上了严重的“失语症”。面对着“新生代诗”（或“第三代诗”）、“90年代诗歌”、“女性诗歌”、“网络诗歌”、“身体性写作”、“新世纪诗歌”等形形色色的诗歌现象和诗学问题时更多的研究者由于丧失了观察、分析和解释这些变化的策略与理论依据而变得无以置喙。而吴思敬和其他少数的诗歌评论家则成了集体失语和“沉默的大多数”之外的发言者。吴思敬则更像是在极其错综芜杂的诗歌迷津中开辟出一条清晰的诗歌道路的开拓者、引路人和发现者。他对“朦胧诗”以及此后更为复杂的诗歌现象与流变上升到学理层次的思考、反思和剖析都对当时乃至当下的诗歌写作和批评起到了相当重要的历史性影响与参照。需要强调的是吴思敬面对不断变化的诗歌发展，其诗歌批评也不断处于调整之中。显然这种调整的能力和自觉对于批评家而言是相当重要的。首先它祛除了固步自封的危险，再有就是这种调整体现了作为一个批评家的反思精神与检省的立场。

吴思敬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三十多年的诗歌批评无疑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话语风格。他的一系列诗歌批评文章无论是理论探讨、现象剖析还是诗人个案研究，不仅富有理性的客观冷静的观照与严谨的逻辑思辨，而且也不乏感性的投入与直觉的悟性。对中国传统诗论以及西方文论的兼容并包使得吴思敬的诗歌评论既有中国本土化诗论的感性与顿悟，又有西方文论的精细入微的文本分析以及各种研究方法的运用。更为重要的是，吴思敬几十年来的诗歌批评不是零碎的即兴式的“感言”，而是同时融合了美学与历史、文化与哲学等诸多层面。他在追踪诗歌现场的同时反观中国现代新诗的历史发展与诗学问题。而中国的诗歌评论者似乎更多的时候是在诗歌理论研究和诗歌批评其中的一条道路上进行，这就如丧失了一只翅膀的鸟和丢失了一个轮子的车一样。这样的单一化的诗歌研究方式不可避免带有相当的局限性和不平衡性。而吴思敬显然以自己几十年的诗歌研究道路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必须同时进行诗学理论和诗歌批评的工作，二者是相互打开的，也是相互裨益的。吴思敬关于诗学理论的研究和诗歌批评关系的认识对于诗歌研究者而言是很重要的，“在诗学理论建设和诗歌批评领域，不断地变更角色，不断地交叉换位，这就是近20年来我所走过的道路。在我看来，诗学理论的研究与诗歌评论的写作是相辅相成的。诗歌批评需要诗学理论的指导，诗学理论越是精辟、科学、有说服力，诗歌批评才越深刻、透彻、一针见血。诗学理论贫困失血，诗歌批评自然软弱无力。诗学理论又需要诗歌批评的推动，诗学理论是思辨性很强的学问，但它不是悬在半空的抽象玄虚的清谈，而是

诗歌创作与鉴赏的实践经验的科学概括与升华。诗学理论与诗歌批评的进行最好能保持同步。诗学理论不能停滞，停滞了，成了一潭死水，便没有生命力了；有了诗歌批评，有了诗歌批评从生活和创作的源头带来的清清的泉水，诗学理论才会永远清亮、明净，滋润着诗歌的繁荣发展和一代代诗歌新人的成长”^①。

吴思敬不仅是一个在诗歌理论上有着创造性建树的研究者，而且是在诗歌评论上卓然独立的大家。在系统地研究中西现代诗学理论的同时，吴思敬在诗歌批评工作中同时进行着两项工作，一是对历史烟云中被埋没的重要诗人和诗群的重新挖掘，如白洋淀诗群，再有就是对优秀青年诗人的大力扶持。

三

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中国社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转型。几乎是一夜之间一切都如破碎的后视镜，一切显得如此遥远、模糊和陌生。而诗歌更是如此。在突然到来的剥夺和巨大的茫然与孤独中，中国诗歌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寒冬。大量的诗人远离本土，大量的诗人在此后90年代的商业大潮中下海。只有少数的诗人仍然站在时代风暴的中心。吴思敬在中国90年代的诗歌发展过程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吴思敬除了深入诗歌理论的系统建构之外，几乎是与此同时，他都是站在每一个时代的高坡上，从而能够看清一个时代的诗歌迷津与真实面貌。他不断在诗歌现场的介入、观察和感同身受也使得他能够更为真切地体会到诗坛的冷暖。

在1990年代的社会转型和诗歌“边缘”期，吴思敬发现伴随着启蒙神话和理想主义的失落，诗人精神的逃亡与心灵的漂泊成为这一时期诗歌写作的一个重要精神趋向。这也能够具有说服力地说明为什么在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北岛、多多、顾城、江河、杨炼、王家新、宋琳、张枣等诗人纷纷去了海外，同时曾经在诗坛声名显赫的诗人离开诗坛或像韩东那样改弦更张写小说，或像更多的诗人下海经商的时代原因了。在吴思敬看来，即使国内的本土诗人也无不经历着这种艰难的精神漂泊的过程，这样在北京就产生了类似

^① 吴思敬：《自序》，《诗学沉思录》，辽海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页。

于圆明园画家村、上苑画家村以及相关的诗群这样寻求精神自由的文化现象。而吴思敬对 90 年代诗歌以及诗人个体生存的“漂泊”特征的发现无疑是准确的。他抓住了那个时代特殊的社会文化发展的精神走向，“这些人抛弃了一般人的价值观念，从现实中的限制自身发展的状态中逃亡出来，过着一种无保障的、物质条件困窘的生活。但这种漂泊生涯与循规蹈矩的生活的一个最大的不同，在于可能获得一种心灵的自由感。尽管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绝对的自由、绝对的自由感是不可能有的，但在漂泊中造成的相对的自由和自由感，对他们便是难得的补偿了”^①。甚至在吴思敬看来，当这一时期伴随着压力、阵痛所产生的精神逃亡仍然不足以消除时代甚至个人的乌托邦理想崩塌之后带来的影响时，诗人的自杀就成了这一时期特有的文化现象。当然，吴思敬除了发现 90 年代这一时期的诗歌带有漂泊和流浪的特征外，也在关于牛汉、郑敏、邵燕祥、李瑛、彭燕郊、王家新、欧阳江河、西川、翟永明等在时代的阵痛和孤独中坚持“终生写作”并对时代发声的诗人的评论中呈现了 90 年代诗歌现象的多层次性。

吴思敬在这些关于 90 年代诗歌的文章中，还深刻地对诗人的先锋精神和先锋情结的变化、诗歌与传统的关系、诗人回归现实、诗歌中叙事性话语的加入等进行了重新的审视与反思。说到上个世纪 90 年代诗歌，我们不能不提到世纪之交中国诗坛的论争，尤其是“盘峰诗会”。作为这场影响极其深远的会议的主办方、发起者、组织者和事件的参与者，吴思敬先生始终以一种相当冷静和客观的姿态在审视和反思着这场论战，而没有像其他的诗人和诗歌批评家因为“意气用事”而卷入到后来愈演愈烈又毫无趣味的争论之中。而吴思敬作为亲历者则相当清醒地认识到先锋诗坛的裂变与分化以及“盘峰诗会”的爆发是迟早的事情。但他认为将这场论争简单地归结为“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争夺权力是不全面的，也是过于简单化的。而吴思敬则以更为深入和宏阔的角度，从命名、身份、诗学立场、诗歌美学、时代背景、创作状况等诸多方面对这场论争进入了分析和反思。吴思敬在强调了“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各自的时代合理性和美学趣味的同时更为深刻地指出“他们各自强调了诗歌创作的一个侧面，有其各自的合理性，也有各自的局限性，理应和睦相处，相互学习、互相竞争才好，又何至于互相对立、

^① 吴思敬：《90 年代中国新诗的走向》，《诗学沉思录》，辽海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253 页。

互相敌视，争吵得不可开交呢？抛开双方的情绪化因素不谈，这里很大程度上是陷入了一种非此即彼的两极思维模式的误区。一个事物不能同时是自己又是别的东西。在考察先锋诗坛内部的分裂与分化的时候，有必要突破这两种思维模式的框子，才能寻找到互相渗透、互相融合的交汇点”^①。这无论是对诗人还是研究者都是一个很及时有力的警告。更为可贵的是，吴思敬在看到所谓的“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不同的优势以及缺陷的同时更为深刻地指出实际上诗歌写作无论是对于一个诗人、一个整体都是丰富多元化的。与众多的诗歌评论家分别站在当时不同的“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立场发言的姿势不同，吴思敬始终是作为一个“个体”的独立思考的批评家在发言。正是因为去除了双方话语权力的偏激而更为准确和客观，也更具说服力和启示性。同时与众多的评论家和文学史家所认为的“盘峰诗会”是一场毫无意义的“口水战”和“诗坛的火拼”不同，吴思敬指出诗歌的争论如果去除情绪化和义气之举是对诗坛建设有益的事情，“盘峰诗会的争论尽管有些情绪化的成分，但毕竟是先锋诗坛内部的一次坦诚的对话。这是一件好事。因为诗的领域从来就不应是整齐划一的，众声喧哗的局面才是正常的。诗人应该敢爱、敢恨、敢骂、敢争论、敢发火。可悲的倒是扔进一块石头也溅不出半点涟漪的一潭死水。盘峰诗会的争吵打破了诗坛的平静，两种写作方式的冲撞为先锋诗歌未来的发展带来了契机。一方面，这种冲撞冲决了诗人固有的审美观念和思维定势，为诗的创造开辟了新的途径；另一方面这种冲撞也会带给读者审美习惯的变革。先锋诗歌这活跃的精灵，将会在两种美学观念冲撞而打开的辽阔空间里自由翱翔”^②。

四

在一个世纪结束，另一个世纪开始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不能不被一种莫名的时间感所牵制。

世纪之交，中国诗坛围绕着一些重要的诗歌现象和诗歌热点问题展开了

① 吴思敬：《世纪之交的先锋诗坛：裂变与分化》，《诗学沉思录》，辽海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96页。

② 吴思敬：《世纪之交的先锋诗坛：裂变与分化》，《诗学沉思录》，辽海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99页。

持续的讨论与争鸣。而吴思敬作为批评家以其宽广的阅读、精细的观察、深厚的学理、反思的姿态、审慎的立场以及丰富的阅历对一个又一个世纪之交涌现的诗学问题做出了准确而客观的回答。无论是在世纪初的新诗走向上，女性诗歌的发展上，还是在“新世纪文学”、新诗的经典化以及“底层写作”等问题的梳理、阐释与反思中都凸现了一个优秀的诗歌评论家的敏识和知识分子的良知与人文情怀。从而与那些流行的媚俗化捧式批评与棒式批评拉开了距离。为数众多的刊物和媒体推出了所谓“新世纪文学”、“世纪初文学”等概念并展开了关于 21 世纪文学前景预测的相关讨论。综观近些年来关于“新世纪文学”的讨论与争鸣，研究者大体的看法是有的认为“新世纪文学”的命名可以成立，有的则对“新世纪文学”予以了否定。面对着众多学者对新的世纪文学的“狂想”与“展望”，吴思敬却是一个冷静的现场观察者、深入的沉思者、精确的分析者和清醒的反思者，吴思敬认为只有从目前的诗歌现象和文本出发，踏踏实实地进行总结和梳理才是正途，而不是毫无根据地夸夸其谈。这一时期的很多相关文章，吴思敬都是以相当冷静、睿智、客观、理性的态度，从诗歌现象、发展态势和大量的诗人创作和诗歌文本出发，从而能够在宏观概括与探幽烛微相结合中生发出具有相当的启发性和准确性的敏识与真知灼见。

值得注意的是新世纪以来中国诗歌界出现了诸多引起广泛关注甚至争议的诗歌现象与诗歌事件。甚至很多诗歌现象登上了娱乐传媒的头版头条。这一切可能都在印证尼尔·波兹曼所说的这是一个“娱乐至死”的时代。而作为诗歌批评家，在喧嚣不已的时代面前，吴思敬时刻保持着冷静与省思的姿态，这都是相当可贵的。而他对当下的诗歌“底层写作”的分析与反思都拥有着重要的启示性，尤其是在“底层写作”已经成为“主流”写作和时代伦理的今天。确实，目前的打工诗歌、农民诗歌、底层写作等现象为越来越多的诗歌评论家和社会媒体所关注。有些研究者从诗歌伦理的角度和诗歌美学自主性的立场质疑“底层写作”这场所谓的时代共谋的诗歌写作热潮，认为有必要对这些诗歌问题伦理化的倾向抱以警惕。而说到诗歌伦理问题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就是诗歌的道德问题，这都涉及到诗歌的“善”即“用”的向度，也就是说诗歌与社会的关系，诗人与时代的关系。而这几乎是 20 世纪一直伴随着新诗发展的长期争论而又聚讼纷纭的话题。实际上，不管是从伦理的角度承认或是批判“底层写作”现象都涉及一个诗人如何有效地以诗歌的方式承担时代和生存个体内心的体验。换言之，诗人如何能够深入当代。

这实际上远非一个新世纪之初的新话题。关于诗歌与时代的关系在上个世纪论证的已经足够多，甚至大批的诗人正因为主流的诗坛被认为没能“深入时代”而罹难流放。吴思敬则在《面向底层：世纪初诗歌的一种走向》中总结了新世纪以来中国新诗的发展趋向，指出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新诗正像我们这个转型中的社会一样，呈现出一种丰富驳杂、多元共生的态势，诸如政治视角的回归，世俗化的审美取向，欲望化写作，人性的深度开掘等等。吴思敬认为进入世纪之交，调整创作取向，面向底层进行开拓不是一两个诗人的个别行为，而成了世纪初诗歌创作的一种明显的趋势。诗歌写作的面向底层，是指当下诗人的一种写作姿态，也标志着世纪初诗歌的一种引人注目的走向。吴思敬指出一个社会，底层总是多数，关注底层就意味着关注大多数群众的命运。而关注大多数群众的命运，也正是一个诗人最基本的人性立场与道德选择。诗人不一定来自底层，但不是来自于底层的诗人书写底层的苦难就一定是居高临下，就一定是不真诚吗？据此，吴思敬认为面向底层的写作不仅牵涉到诗人的写作倾向，而且关系到诗歌的内在质素。更为可贵的是，吴思敬避开了一些研究者狭隘的在诗歌伦理问题上绕圈子的危险，更为精辟地指出作为诗歌面向底层的写作不应只是一种生存的吁求，它首先还应该是诗。也就是说，它应遵循诗的美学原则，用诗的方式去把握世界、去言说世界。我们在肯定诗人的良知回归的同时，更要警惕题材决定论的回潮，“伟大的诗歌根植于博大的爱和强烈的同情心，但同情的泪水不等于诗。诗人要将这种对底层的深切关怀，在心中潜沉、发酵，通过炼意、取象、结构、完形等一系列环节，调动一切艺术手段，用美的规律去造型，达到美与善的高度协调与统一。也许这才是面向底层写作的诗人所面临的远为艰巨得多的任务”。我想吴思敬的这一段话对于任何所谓的底层写作和研究者而言都有着切实的指导意义和理论深度。

而随着世纪之交的各种名目的诗歌选本的大量涌现以及新诗史情结的影响的焦虑也由此引发了关于新诗“经典化”问题的讨论，很多报刊都组织了相关的栏目进行争鸣。而在吴思敬看来，关于新诗的经典化问题由于涉及到当前复杂的诗歌现象所以只能是“一切尚在路上”的讨论而不能轻易下定论，进而吴思敬又强调，诗歌经典不是诗人自封的，也不是哪一位权威所“钦赐”的，而是以诗歌文本为基础，在读者的反复阅读与接受中，在批评家的反复阐释中，在政治体制、新闻出版、学校教育等多重因素的合力作用下建构而成的。

综观 30 多年的诗歌理论研究与诗歌批评，吴思敬不断创设着一条独特的诗学道路。而几十年来，吴思敬所从事的诗歌理论与批评工作的重要性和对中国诗坛以及批评界所带来的一个重要的启示还在于他在纷乱的诗歌现场和逐渐被淹没的诗歌历史远景中挖掘和“发现”了那些被遗忘和历史的减法强行删掉的诗人与诗歌现象。而这种对诗人和诗歌现象的“发现”的能力似乎只有吴思敬、谢冕、洪子诚、程光炜、陈超、王光明、唐晓渡、耿占春、燎原等极少数的诗歌批评家能够做到。例如，如今在中国诗歌史上早已经被经典化的“白洋淀诗群”就与吴思敬以及他所主编的诗歌理论刊物《诗探索》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而吴思敬和《诗探索》组织发起的这场寻访白洋淀诗歌群落的活动在中国诗歌史上的意义是深远的，它强有力地镌刻在诗歌和中国历史的纪念碑上。回顾吴思敬几十年的诗歌理论与诗歌批评，无论是新诗潮的早春，八十年代纷乱的诗歌运动，还是九十年代的诗歌转型以及更为繁复的新世纪，他在不断建构自己独特的诗学体系的同时，对诗人创作、文本解读、诗歌现象以及重要的诗歌问题都做出了精准的富有启示性的言说。在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已经结束的时候，吴思敬仍然在诗学的路上跋涉、探寻。

从新诗潮到新世纪，中国的诗歌批评呈现出越来越多元化的倾向。而多元化倾向的同时，也形成了中国当下新诗理论和批评的自白状态，即各说各话，而听者寥寥，共鸣者更少之又少。而吴思敬几十年的诗歌理论与诗歌批评之所以能够今天看来仍然充满创见、预见、活力和有效性，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是他对诗歌精灵的不懈的追索和探询，不断用真诚、良知、新见和敏锐对诗歌说话、对诗坛发声。

回首来路，中国新时期以来的诗歌充满了烟雾笼罩的迷津，在一个个令人迷惑的十字路口和令人目眩的“魔方”中吴思敬却是一个时刻保持清醒、冷静和远观的健行的引路人。正如瓦雷里所说的，吴思敬就是那个登高望远提前眺望到澄明未来的人，尽管吴思敬已经不再像他年轻的时候那样身体健壮、精力旺盛，但是他仍然以同时代的人难以比拟也难以想象的对诗歌无比热爱的火热之心在继续前行。在北京朝阳区的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展厅中有一个巨大的青花瓷瓶，上面烧制了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的亲笔签名和每个人题写的一句话，吴思敬所题的是“永远葆有一颗童心”。正是这种可贵的童心、赤子之心，使得几十年来吴思敬不论是在为人还是做学问上都葆有了可贵的真诚。而正是这颗火热的心让他在追寻缪斯的道路上无怨无悔！在新世纪的曙光里，在商业化、工业化和城市化无限加速度运行的时代，还是让我们再次

倾听吴思敬的这段话吧——“在当今这物欲横流的世界中，写诗是寂寞的事业，搞诗歌评论更是加倍寂寞的事业。但是我不会为自己的选择而后悔。不管诗歌和诗歌评论滑向边缘的何处，我甘愿当一名‘边缘人’，坚守我的追求而矢志不渝”。追寻诗歌精灵的足迹仍然无怨无悔的在路上前行，在一个个满布纵横的诗歌迷津中，吴思敬先生发现了一条坚实的路，一条永远葆有对诗歌的赤子之心的路！

目 录

从新诗潮到新世纪（代序）/霍俊明	1
------------------------	---

第一辑 综论

摆渡者的侧影：仁者无疆/沈奇	3
星河望尽证诗心/子张	11
新时期诗学的探路者/姜玉琴	14
撒播诗的新绿/陈卫	25
走向哲学的诗性探询/张桃洲	37
吴思敬与“朦胧诗人”二三事/霍俊明	45
理论的自觉与批评的睿智/张松建	57
“主体性”精神与全方位的诗学开拓/张大为	65
新诗现代化历程的和谐与融合/金慈恩（韩国）	78
“另一半的追寻”/张立群	86
智者魅力，长者情怀/龚奎林	96
持守常识，鼓励探索/王士强	102
诗心可鉴/徐秀	112
同路人和持灯者/陈亮	114
追踪诗的精灵/罗小凤	121

第二辑 专评

我读《心理诗学》/谢冕	133
新鲜·系统·扎实/陈超	135